

從歷史看港大

教育系馮可強

(一)港大自命的任務

「如果這一間大學依照它的創辦者所訂下的正確方向發展，我懷疑在出席今次盛會的人當中，有沒有人深切了解到我們現在開展的工作是怎樣重要；這間大學可能亦將會對中國的未來，與中西關係（尤其是中英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

以上是港督盧吉 (Lugard) 在一九二二年香港大學開幕典禮上的一段演詞。這位一手創辦港大的總督先生，自謂成立港大是他香港任內的首要任務；現任港督，自不免得意忘形，更願將來一番。在這段說話裏，他標榜了港大的兩個宗旨：第一是通過文化交流，增進中西了解，也就是「溝通中西文化論」。第二是「為中國而立的論」。

根據前一論，港大的創立是為中國訓練人才（醫生、工程師、教員、政府高級行政人員等）。盧吉認為當時中國對西方知識有「極熱切的渴求」，在香港成立一間大學，正好滿足這種需求，而且一定會受中國人歡迎，因為香港連接大陸，中國青年不必遠渡重洋，忍受長時間離鄉別井之苦。而且在香港受西方高等教育，學費比較便宜。在盧吉的想像中，香港大學既有這些優越條件，必能吸引大量中國南方，甚至北方的莘莘學子，發展成為中國及西方知識的入口，與未來領袖人才的訓練中心。

根據後一論，香港殖民地因為地處大港，華洋雜處，正好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在香港設立一所高等學府，可以達到「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并把西方介紹給中國」(Interpreting China to the West and the West to China) 的任務。在一九二一年港大法例的緒言中所列之數項宗旨，其一是「與鄰近國家——中國——維持良好了解」，也就是所謂「溝通中西文化，增進互相了解」，便成為後世香港政府與港大當局官員所津津樂道和奉為圭臬的核心理論。不久以前，港大副校長樂品澤在「學慶」的一篇文章中，也曾慨乎言之地提及盧吉創辦港大的「苦心」。

(二)脆弱的假象

任何一位對近代歷史稍有認識的人，都會對港大與中國服務與及溝通中西文化而立的理論發生懷疑。首先，十九世紀英國在西方豪華的歷史中，曾經扮演了一個怎樣可恥的角色，事實，已是衆人皆知，這裏也不必細說。簡而言之，率先以炮艦打開中國門戶的是英國；以鴉片毒害中國人民、控制中國關稅主權、強逼滿清設立治外法權的是英國；以投資方法控制中國經濟、英國國庫軍火、鼓勵日本與俄國爭奪滿洲權益、英國是有日大中國。試問：這樣一個最先侵略中國、最先打中國門戶的人，難道英國主權者不該感到羞愧嗎？

教育系馮可強

盧王助精神？也難道帝國主義政府也有國際主義的無私互助精神？

第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香港殖民地政府對於教育完全採取順其自然的放任政策。當時港內的極大部份學校，都是由華人私宗教團體主辦的。政府除了與辦極少數量的政府學校，與及對私校提供經濟援助外，對教育並不積極提倡。到了一九一三年，才通過第一份正式的教育法例，加強政府對教育的管制。而盧吉已在九〇八年開始籌辦香港大學。一個政府對其殖民地的教育也不肯盡力，而竟肯花費大量時間、金錢和精力，專為殖民地原屬國家的教育事業盡力，這裏面不是有些古怪？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樣？讓我們假設，揭露港大的本質。

(三)「為中國而立的論」的陰謀——看中國郵報的論據

最先提議建立香港大學的是一九〇五年的「中國郵報」(China Mail)。有關港大歷史的書刊或文章，全都提及此點，但對此事一筆帶過，未有稍為敘述當時「中國郵報」(以下簡稱「郵報」)提議的理論根據。無他，他們就是不敢公開事實，因為該報的論據，赤裸地暴露了大英帝國主義者建立港大的真正企圖，也同時顯現了英帝復華的野心。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郵報」在一篇題為「在香港設立一所帝國大學」(An Imperial University for Hong Kong) 的社論中，提議建立港大。以下是該社論的節錄：

「……為將來準備國家昌盛的一個必需條件，尤其是在這個急劇轉變與進步的時代。在現時的香港，此種準備極為重要。近幾年來，遠東產生了巨大的變遷；這些變動將會對本殖民地的通商與繁榮條件有重大影響。日本打破俄國與其簽訂和約，使明治維新運動所帶來的奇妙成就，更形錦上添花。日本是我們的朋友，我們與之簽有一極親密的條約。但在中國的將來發展中，日本將會比前更甚地成為我們的對手，雖然我們希望它會是一名友善的對手。無可置疑，遠東永久性和平的恢復，一定會引起通商現狀的加速轉變。中國門戶開放的趨勢愈趨愈烈。條約通商港口再不會存在；中國每一港口都會開放給外國企業；結果必然是港口之間的貿易大增。外國情況發展下去，像香港與上海一樣，日型轉運中心，便愈來愈失去它們的重要性。代之而起的是每一通商港口的小型商業。很自然地，在此發展中，英國的一份會不會有按比例的遞增？英國究竟能否維持它現時的位置，也成問題。

「中國遠大的將來操在日本與大英帝國手中。……日本在地勢與國民生活狀況上，有它的優勢條件；我們必須看它在將來將來會做的工作上做了甚麼。日本正在正以驚人的速度在中國擴張它的利益。……日本在東亞的擴張，是遠非不謹慎的文化侵略。

「並確保它的投資有所值。在此點上，日本人是夠聰明的。遠在日俄戰爭之前，甚至在戰事期間，日本已在中國各地佈置好它的文化傳播者。戰後，這些傳播者的數量又更大增。究竟這種方法的要點是甚麼？就是現代教育。日本在東亞的教師甚多，在北京比現在更在學校與大學裏控制了重要的職位。同時，日本在東亞設有大量高等學位，供應中國留學生。日本地近中國，中國人自然寧願選擇到日本留學。

「讓我們反過來看看大英帝國在同樣工作上做了些甚麼。首先，我們的教會學校在東亞各地，無疑這些學校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傳播了英國的思想與擴展它的影響；但與日本不同的是：我們缺乏一個廣泛的制度，和同一目標連貫的明確之心與興趣。……作為英國在遠東的影響之中心與泉源：香港，在東亞中國人方面又怎樣？除了一些宗教團體辦理的學校外，我們不能否認政府管理的小規模的地區學校。我們不能否認這些學校盡了很大的貢獻，正如聖仁書院校長在最近的年報上所說：「假設有九千名學生在這些畢業，而其中有三份一散佈在中國，我們就有一支三千人的不受薪小軍隊，致力於西方思想的傳播工作。」不過，這是不夠的。香港現只有中小學教育；大英帝國與北方的對手競爭，中小學教育是不足為用的。

「香港所需要是一所大學。中國南方，甚至北方的人，定會選擇此所近便的學院。……在香港設立一所大學，會成為一項帝國投資；對於英國繁榮來說，為此目標使用一筆公費是有價值的……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正如一位皇室人物所：「二十世紀的遠東是屬於日本的。」(節譯自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國郵報」)

事情的真相難道還不顯明嗎？當時的「郵報」是英國的喉舌；它的言論，也就代表了英國的言論。在這個「國家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時代，很少人會甘願順從帝國主義的臭名。但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很多英國人都以大英帝國為榮。且看「郵報」這種自居為大英帝國衛道者的咀臉：

「在會館接受中小學初步教育的人當中，帝國宣傳工作最有效果。大批中國學生正前往日本；他們在那裏可能得到一些反英偏見。香港與大英帝國的任何其他屬地的利益，全靠與大英帝國的任何自由貿易投資。

「郵報」深切相信：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高階青年，會毫不猶疑地接受這個英式西方教育階層。那麼，港大就可以訓練出一班受英國思想影響的買辦階級(「小英人」)，替英國在華利益服務。這不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而是遠東不謹慎的文化侵略。

「郵報」這項建議究竟在英政府與港府官員中產生甚麼影響，我們不得而知。但它却引起一番爭論。反對者的主要論點是：英國的本土教育，正需要大量經費；在香港中國人設立大學，就會剝奪英國人受教育的機會。至於建立港大的帝國主義目的，卻似乎引起任何興趣；正如當時一篇讀者來函說：「對於所有愛國教育，及相信英國擴大它在遠東影響力的的人，該建議是足以引起同情和興趣的。」

「郵報」在會館接受中小學初步教育的人當中，帝國宣傳工作最有效果。大批中國學生正前往日本；他們在那裏可能得到一些反英偏見。香港與大英帝國的任何其他屬地的利益，全靠與大英帝國的任何自由貿易投資。

「郵報」深切相信：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高階青年，會毫不猶疑地接受這個英式西方教育階層。那麼，港大就可以訓練出一班受英國思想影響的買辦階級(「小英人」)，替英國在華利益服務。這不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而是遠東不謹慎的文化侵略。

「郵報」深切相信：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高階青年，會毫不猶疑地接受這個英式西方教育階層。那麼，港大就可以訓練出一班受英國思想影響的買辦階級(「小英人」)，替英國在華利益服務。這不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而是遠東不謹慎的文化侵略。

「郵報」深切相信：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高階青年，會毫不猶疑地接受這個英式西方教育階層。那麼，港大就可以訓練出一班受英國思想影響的買辦階級(「小英人」)，替英國在華利益服務。這不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而是遠東不謹慎的文化侵略。

「郵報」深切相信：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高階青年，會毫不猶疑地接受這個英式西方教育階層。那麼，港大就可以訓練出一班受英國思想影響的買辦階級(「小英人」)，替英國在華利益服務。這不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而是遠東不謹慎的文化侵略。

「郵報」深切相信：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高階青年，會毫不猶疑地接受這個英式西方教育階層。那麼，港大就可以訓練出一班受英國思想影響的買辦階級(「小英人」)，替英國在華利益服務。這不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而是遠東不謹慎的文化侵略。

乙、後台老板——英商

太古洋行的創辦者史德 (Stewart)，是華商片寶與連東船運起家的大家，也是與名聞遐邇的渣甸 (Archer) 的兄弟。他控制了中國的報運事業，並設立了至今尚存的太古糖公司。十九世紀末，他預測到香港將成重要海港的未來發展，便率先開辦香港船隻建築與修理業，在一九零零年置地建立太古船務公司。這間商行在一九零九年捐款港大，以資助訓練人員及建築家，是為了什麼目的，不言自明。另一方面，提出捐款的董事史德 (Stewart) (當時史德已死) 曾在致同僚的信件上寫道：

「我致同僚的信件上寫道：『計劃會成功地教育出合適的中國人 (The Right sort of Chinese)……反之，在中國中心建立一所英國大學，可能會受當地官員控制……香港的計劃，應該得到全國貿易有關的公司和商家的強力支持。』」

這位史德先生的口氣倒不小：中國人應該是什麼樣子也要他來管！英商與英政府是怎樣一鼻孔出氣，在這裏應該很清楚。

並不是所有中國人對此事都懵然不知的。一九零九年北京一份報紙的一篇文章，就揭露了帝國主義者的真正企圖。

「德國在青島、英國在香港都在籌辦大學。表面上它們對促進中國教育十分熱心。而其實，它們是在搶奪本國在教育上的權力。」

丙、滿盤皆落索

港大成立了，但帝國主義者並沒如願以償。首先，港大政策的基本假設，是中國的現狀不變。但在港大於一九二二年三月開幕之前數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政權，也同時消滅了港大賴以達成目標的必需條件。其二，盧吉等人低估了中國發展本身高等教育的能力，也忽視了其他國家的競爭力量。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大學紛紛成立，中國人既有本土的高等教育學院，為什麼還要走到本國領土上的英殖民地來辦大學？其三，盧吉堅持港大以英語授課，因為他認為英語是傳播西方知識的最佳工具。但他沒有想到：中國一旦有了以本國語言授課的大學，港大的吸引力會大大減少。其四，盧吉等人也低估了港大的經費預算；後來港大一直處於經濟困難中，港港府大量撥款補貼，為了一所四流大學。

換句話說，英帝國主義者全套數部計錯了；也即是說：他們的主觀願望沒有符合客觀形勢的發展，結果夢想破滅。港大的本質沒吸引了大批中國留學生，反而成為「港大的本地大學」。例

如：一九二三年的畢業生中，只有六位是由北京政府派來。一九一八年港大副校長伊列律(Bio)親自訪問北京，企圖與中國教育部長，接洽港大為中國政府學校訓練教師的計劃，結果不得要領而回。以後的歷屆副校長，也曾力謀與中國重申「為中國而立」的宗旨，但大勢而去，帝國主義者的政策徹底破產。

(四) 溝通中西文化論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在中國的地位急劇衰退，代之而起的是日美勢力的膨脹。無論在經濟與文化侵略方面，英國已無力與後二者抗衡。另一方面，在一九二五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全國各地，包括香港，都掀起了反英運動。英國在華聲譽危在旦夕。同時，英國還派漢口與九江租地，象徵英在華進一步的衰退。港府明白：在這個時候英還不退港大換上一件溝通中西文化的新外衣，它便會失去作為英國在遠東唯一大學的存在價值。

「一九二五年，港大拋出一個新口號『把中國介紹給西方，與把西方介紹給中國』，也就是所謂『溝通中西文化』」。當然，這個宗旨以盧吉開始在港被提及，但初期的宣傳重點仍是一「為中國而立」。到了二十年代末，事實真在此，此口號已不能再喊。港府只得退而思其次，標榜溝通中西文化，希望在學術尊嚴的掩護下，與中國攪好關係，並暫時保留實力，觀察中國局勢的發展。

一九二七、二七年，副校長韓傑耳(Ho-Hell)在金文泰總督(Clementi)的支持下，積極籌辦中文系，並特派中文講師賴際熙博士到馬來亞等華人聚居地籌款。一九二七年，中文系正式成立。其後數年，中文系逐漸擴展。到一九三一年，又得鄧志昂與馮平山捐款，成立鄧志昂中文學堂和馮平山圖書館。

韓傑耳在一封致西商會(H.K.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的信件中(一九二八年，把成立中文系的口說得清清楚楚)：「如果英國人要通過文化途徑去改善他們在中國的地位，第一個必須的步驟，是在中國設立一所研究中國和任何有關中國事物的學院。如果本大學未能做到此點，便不應繼續存在。」

這個所謂文化交流的政策，只不過是改善中英關係的一種鬥爭方式；港大的本質仍是宣傳英國文化，仍是在中國製造實質階級。金文泰在一九二九年的大學頒獎典禮上的講話，就露出了尾巴來！

(五) 「為香港服務」的新階段

戰後，大學建築物毀壞不堪，港大面臨關閉的危機。港府特委郭士(O'S)調查重建的可能性。郭士在他的報告中，猛力抨擊戰前港大的師資缺乏、設備不足、水準低落的狀況；並說：如果大學繼續前水重覆，只會損壞英國在遠東的聲譽，也會失去與中國的文化關係。那就不得不辦。他建議把重建的港大，提高至英國名牌大學的水平，以維持英國在遠東的聲譽和應有優厚的獎學金和住宿供應條件，吸引中國學生和研究員。

英國當時在亞洲的勢力已急劇衰退，它的殖民地紛紛獨立。郭士的提議，是希望在遠東留下一文化大本營；但同時，他還充滿滿吉的夢想。中國內戰爆發，國民黨政府如山倒象的對象，很快表面化了。一個反對任何帝國主義侵略的新民主政權，即將成立。英倫政府不得不承認一項事實：港大作為文化侵略的工具，已失去價值。但另一方面，香港的經濟發展潛力，也露其端倪。港大「為香港服務」的新階段來臨了！

(六) 大退却與大轉變

從一所肩負捍衛帝國利益在華利益重心的帝國大學，降為提倡香港經濟利益的殖民地大學，是大英帝國沒落中的一次大撤退，也是英國在遠東利益與矛盾的大轉移。一九四九以前，英國在遠東的利益集中在中國，其主要矛盾是與美日在華的利益衝突。解放以後，帝國主義諸國被迫從中國大陸捲席而逃；同時大量廉價勞動力的資本、企業家、技術人才湧入香港，形成一股龐大的經濟發展潛力。英國的利益中心乃移至香港；其主要矛盾乃改為與中國人民(包括香港)在殖民地統治問題上的對立。所以，英國政府在戰後所面臨的難題，是如何鞏固在香港的殖民地統治，重新部署它在亞洲的經濟的利益。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故技重施。只不過，今次訓練的買辦階級，是留在本港服務，其效勞的主人(英國政府)則一。

任何一個殖民地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把當地屬民分而治之；培養買辦特權階級，是在人民當中製造矛盾衝突的最佳方法。大學就是選拔買辦人才的訓練中心。

「我們必須供應一些教學設施，以製造大批訓練的候選者，並吸引其中最後優秀者參加政府工作。這就是本大學的首要職責(Keewick Report)」。一九五二年新士域調查報告書(Keewick Report)：「香港大學與馬來亞大學……是民族關係攸關成功的兩個場合；他們……教育青年，將成為當地兩個領袖人物……」

(七) 結論

教育是為政治服務。在事實之前，一切偉大的空話都必然自暴其醜。這間大學從成立到現在，在實質上一直所滋養的帝國的殖民地大學(殖民地大學其實就是帝國大學)。所謂「為中國而立」或「為香港社會服務」，都只是毒藥裏的糖衣。一本裝璜美觀的港大歷史，其實是一番血淋淋的英帝侵華史。

教育不能脫離經濟與政治而立的，所謂「促進文化交流」與「致力學術研究工作」，不是掩飾帝國(殖民地)主義者野心的聖袍，便是頭腦簡單的學者之痴人說夢。真正的文化交流，應該是雙方面的，站在平等基礎上的自由溝通，而

英倫的真正企圖是向中國人傳播西方(英國)文化，製造一小英國人；交流不過是幌子。中文系的成立，是為了粉飾門面；鄧志昂文學院被用作訓練講中國話的殖民地官員與傳教士；英語所研究中心，成為了收集情報大陸情報站；英語始終是授課語言；課程是與新中國無關的西方學問，便是與社會實際脫節的陳谷子爛芝麻……在「尊重中國文化」的表層下，却是統治民族之文化壓迫。

大學教改運動究竟有多大成就，實在難說。但如果同學們能因而認識到這是一間怎樣的大學，進而大破洋奴買辦思想，也算是對人民、對國家、對自己盡了點責任。

有朝一日，香港大學易名為「反帝大學」時才是真正的教育革命的開始。

預告：

●社會主義思想的介紹

對任何主義和思想流派，在批評和認同之前，必須加以深入的認識，否則便會流入盲目的毫無根據和不負責任。在現今的世紀中，於中國國內佔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不獨決定了中國人的命運，即對全世界人類(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精神和物質發展方面，亦佔有很大的影響。於是，無論認識我們的祖國，或認識這股人類發展的力量，乃至為找尋改良我們現在生活的路向，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都是急迫需要的。故此，本報將在下期開始，每期提出一些篇幅來介紹社會主義思想。

下期的主題是「個人主義」，本報特選載一些中國在一九五〇年代發表的有關文章。下面是其中的一些語錄：

「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文中說：『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階層的知識界，一般地和整個地說來，其特點是個人主義，而不能接受紀律和組織。……尼采的哲學及其崇拜的超人，認為自己在任何程度內服從任何偉大的社會目的，都是下賤可恥的事情。』……這就是說，照個人主義者看來，只有他自己才是世界上最要緊的。因此，他們選定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生觀。他們把為集體主義利益而犧牲自己利益的人看做傻瓜。……」

我們極歡迎讀者們就這個主題發表意見。

●要揭發在現存制度下一切不平等現象，披發社會醜惡的面貌，我們必須要認清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究竟在歌舞昇平背後，殖民地政府怎樣控制了香港的教育和經濟，大資本家怎樣剝奪小市民的利益，這些都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要改造社會，建設社會，我們必須明瞭社會的動態，以冷靜的頭腦，客觀地分析當前的形勢。

本報從下期開始，將會有系統地刊登一連串有關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文章，從而反映出香港政府的統治政策，小市民在政府與大資本家壓迫下的生活狀況，以追尋出社會問題的基本原因。本期我們刊登了一篇「帝國大學」及一篇有關香港改革的文章，下期我們將會講及香港的稅制。希望讀者都與我們一樣，抱著認清事物的態度，一同積極參與討論，認識自己的社會，了解事情的真相。

最近在一次港大教育改革的座談會上，聽見醫科生的理想與氣魄，又去了那裏？

- 主要參考書目：
- B. Harris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First 50 Years.
 - M. Perham: Lugard.
 - Drage: Taiako
 - T. C. Cheng: The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M. A. Thesis)
 - K. C. Ka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Post-war Hongkong (M. A. Thesis)
 - N. H. Lun: Educational Policy & the Public Response in H.K. (M. A. Thesis)
 - Keewick: H.K. Committee on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1952
 - China Mail 1905
 - Vice-Chancellors' Reports.
 - Education Dept.: Educational Systems of the Chief Colonies

一九五〇年新士域調查報告書(Keewick Report)

這個教育政策的一面，是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大搞民族和諧；另一方面，則是在被統治者當中，通過物質刺激、利益分配方法製造階級矛盾。滿清以華制華、用科舉制度化漢人的政策，得以在香港發揚光大。層層考試關卡，把千萬學子的精力與青春消耗在密封罐頭式的課堂裏，使他們成為「胸懷銀錢，放眼禮儀」的現貨動物。港大則是一所萬人仰望的寶塔，生產「既能替主人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主人安寧」的「一稱心如意」的奴僕。

據港大「職業輔導處」(Appointments Service)統計，一九七零年港大畢業生(醫科生除外)四十分之一成為「一入便門深如海，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政府公僕，三分之一受僱於工商業機構，向資本家折腰。所謂為社會服務，其商業主要是為政府與資本家效勞。每年港府與西商會對港大的財支持，難道會是白費的。

一九五八年，港大維持良好中斷除了「與隣近國家——中國——維持良好關係」的宗旨，也就是正式割斷了它與中國的歷史關係，成為一所純粹的殖民地大學。